主编:何敬东 编辑:吴智钢 组版:美 玲 Email:PPLL18@126.com 电话:0755-83517232

从美国“再工业化”看中国制造

井水明

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

日前，在苏州举行的“美国经济新战略研讨会”上，专家们对奥巴马总统新近提出的经济新战略进行了研讨。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要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也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回顾美国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制造业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由于资源环境问题，传统产业失宠于投资者；今天的美国，正实现着由过去把工业生产大量环节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到现在“再工业化”的快速转身，这个调整和“转身”令人关注。

应当看到，美国人提出“再工业化”的战略，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由于经济总量巨大，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仍高达20%左右，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事实无法回避。现在，美国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本土工业，一方面是防止制造业萎缩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一方面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像“智慧地球”一样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而不是仅仅恢复传统的制造业。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就是在加快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实现再一次依靠“再工业化”来推进实体经济的转身与复苏。

制造业是中国立国之本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给我们留下思考是深刻的。对当前中国经济而言，依靠产业投资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复苏，一样至关重要。制造业是中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中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目前中国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贡献出口总额的90%，未来10至20年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

“中国制造”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每产生10%的增长，就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居全球之首，制造业比重增速远远超过美国。2007年我国制造业GDP增加值按美元计算达13000亿，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从3%提高到13.2%，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华盛顿经济咨询机构近期预测，2009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例将达到17%，而美国将从2007年的20%下滑至2009年的16%。中国将于2009年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较预期提前了4年。

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需要提升

虽然比较优势仍然会推动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但是一些影响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宏观因素也不容忽视。库兹涅茨理论表明，产值最大化（经济较快增长）是工业化发展特定时期的常态发展过程，但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

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和11.69个百分点。

从行业整体利润回报率来看，美日制造业都是利润率极高的行业。近几年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美国对外出口的全部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到72%。而相比之下，近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国内制造业实现利润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产能扩张出现转换拐点。

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单价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我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我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在减弱、出口的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贸易附加值在下降。

目前，中国经济80%是实体经济，传统产业占有相当比重，存在着巨大的提升、创新空间。而要实现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梦想与目标，就要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用技术进步解决传统产业技术落后的问题，引导更多投资推动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技术的更新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从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中提升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以新兴产业支撑创新型经济、引领危机后经济增长以至成为新的产业增长极，努力做大做强中国企业的规模，加速培育中国制造的自主知识产权，从而走出以往制造业发展中“产业先进、环节低端”的老路；通过市场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来优化中国制造的特点和个性，按照新型工业化的思路，来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和进步。

焦点评论

财经时评

调结构是同自己的过去和解

邵 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基调——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夯实三农、深化体改、稳定出口、保障民生。核心是稳增长，调结构。

“稳增长”无需要担心

“稳增长”需要担心8%吗？完全没有必要。中央政府从4万亿刺激计划中找到了信心。实际上这是屡试不爽的一招，例如在上一次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其实也是美国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精髓和日本1990年代开始的反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时的常用套路。尽管观察者们会指摘和质疑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但非常时刻，非常举措。正是这个量级项目的支持，中国真正挺住了经济危机正面冲击的第一波，赢得关键且宝贵的信心以及调整的时间和空间。2009的V型反转让决策层信心坚定，增长全无悬念。

但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新故事和新征途，才刚刚开场。2010年中国经济由非常(艰难)时期进入转折时期——对内，面临即将关闭的人口红利窗口(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大致在2015至2020年)，届时恐怕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人就会未富先老，使得经济进入一个低水平均衡和中等收入陷阱。对外，则面临日益缩小的全球化红利窗口，贸易摩擦、汇率升值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的销售市场和利润空间，外向型经济的成长空间受到制约。

调结构仍旧困难重重

突出重围的方法是唯一的——结构调整。调结构仍旧困难重重，这是个每次必谈，还得再谈的老话题。调个结构咋就这么难呢！因为生成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原因是路径依赖的，它的核心实际上是被张五常称为所谓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县竞争制度——GDP锦标赛。中国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在财政分权，行政集权的现行体制下，几乎每个县都制定有自己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都在招商引资，都想上产能（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都在搞基建争项目，要融资获取资金（不管是卖地、从银行借还是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渠道），正是这种力图造福一方和获得行政序列上升奖励的比赛所激发出来的各级各地行政主体的热情，加上普罗大众实现求富愿望的干劲，成就了中国这30年让人瞠目结舌的快速增长。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还分在不发达国家组的选手，30年跌跌撞撞一路狂奔，居然跑出了个全球团体总冠军。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GDP锦标赛制度，也产生它的各种副产品——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盲目追求城市形象，基本建设战线拉长，土地财政依赖性过大，政府人员、机构冗余，税负全球第二，地方财政风险上升——中国目前经济中各种弊病都由此而来。众所周知，由于存在合成谬误，个体最优未必全局最优，中央和地方始终存在着政策博弈，每当中央着手尝试去解决这些困扰已久的问题时，棘轮效应每每显现——扩张简单，总量压缩和结构调整费劲。有时中央被迫动用行政手段，例如铁本事件；或者国进民退，例如山西小煤窑，费时费力，收效甚微。

优化制度扬长避短

怎么办呢？是不是放弃以GDP考核的这套县竞争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制度来实现扬长避短，为了继续保持这个制度的优点——鼓励地方上的发展干劲，同时去掉由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带来的盲目性和控制整体风险，操作上无非两条线索：

一是减少竞争主体总量，减少GDP锦标赛的参与选手数目。例如目前在浙江、安徽等18个省试点的省直管县模式，就是通过减少行政层次，力图推动财政和行政上的双直管。最近一年，中央政府一直在批复都市圈或者重点建设区域的整体规划，使得中国经济布局的三纵两横呼之欲出，沿海线——京广线——兰渝成昆线——长江黄金水道——陇海北疆线，在这些线上布局的40至50个超级城市和都市圈将成为未来参与竞争的主要选手。当新一轮重点建设和城市化集聚在数目有限的超级都市圈及其周边卫星城镇系统时，抓大放小就会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指导能力，也更容易实现政令畅通。

另一方面，在这些新的（超级）城市实施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会使得行政层次扁平化，极大的提升行政效能。而且如果进一步的投资都限制在这些有限的重点建设区域，投资密度和强度的提高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虹吸效应就会全面显现，辅助于放开户籍、提供廉租房等城乡统筹政策，人口和产业自然就会开始聚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到渠成，从而有可能真正实现在聚集中走向平衡增长。再辅助于改变竞争主体行为模式的考核机制，例如在现有考核指标体系下增加考核民生方面和考核同环保节能潮流相适应的减排指标。这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潮流又可以敦促决策主体统筹考虑，使得产业结构和城市布局更趋合理。

调结构考验决策者智慧

政策看点——在操作层面，完成结构调整目标，依旧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他们必须灵活穿插着同时运用市场和行政两套手段去完成任务目标，例如在实体经济方面，考验规划官员的统筹能力，投资官员的项目甄选能力，商务官员的政策引导能力；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则要求央行官员做得更好，超越简单总量政策(基调宽松)，精确打击热钱和平息经济中的过度流动性和投机性；超越仅仅关注主要反映食品价格导向和产能过剩结果的CPI，而关注用美元衡量(被迫缓慢升值)的核心资产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

更大的视野——结构调整实际上意味着同自己的过去和解，是在历史并没有被终结后的一种全新的尝试。这种努力并不是简单重复这个古老国家曾经经历的辉煌和苦难，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消费主义的耗尽整个世界资源满足一部分人的私利，它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和更重要的使命，它是集约的、可持续、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的，这种尝试理应具有普世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个转折时期的努力是在开创人类历史。我们清醒，我们乐观，我们努力。

（作者系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明智选择

罗瑞明

福特公司12月23日在其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德宝市的总部宣布，已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出售旗下沃尔沃品牌的所有实质性商业条款达成一致。

沃尔沃对世人来说并不陌生，沃尔沃公司的产品包罗万象，但主要产品仍然是汽车。沃尔沃汽车以质量和性能优异在北欧享有很高声誉，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风雨飘摇的福特汽车一年前希望将沃尔沃汽车出售。据知情人士透露，1999年福特从沃尔沃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其交易价格为64亿美元，吉利的出价为20亿美元，是10年前福特购买沃尔沃时价格的1/3。可说吉利捡到一个“大漏”。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和高新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要想创新和发展，必然就要采取“走出去”吸收他人的技术，可是他人的技术并不是那么容易教给你，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国外先进设备不仅价格高，而且还存在技术封锁；一些高端技术企业不要说是收购，就是再三请求到工艺流程的现场看一眼也不容易。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国家企业倒闭资本缩水，境外投资并购优质企业、资产的机会增多，投资成本降低，交易条件改善。此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走出国门，对影响力大的品牌企业进行收购恰逢时。

收购国外企业打造自己的产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有足够的资金作支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更重要的是对他国的产品要有足够的了解，哪些产品属于先进，哪些产品有利于长远的发展，能为我所用。因而，要选得准，看得远，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我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用高档车的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以国内为轴心，发展世界顶级车生产，不失为一种长远之策。

吉利目前是中国汽车行业领先的民营企业之一，但现在的领先不等于将来的领先，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会贻失良机。要使自身不断的壮大，保持领先地位，就要敢于“走出去”，把握有利的时机主动出击，占领市场制高点。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明智之举。

实话实说

财经漫画

股民圣诞大餐

王志成/图

新股定价应有中小投资者参与

周义兴

以创业板IPO为代表的新股大比例超募现象受到了监管层的关注。据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CBN记者透露，证监会相关部门正在就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与会商，就发行、定价、审批、承销和配售等环节作出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争取在2010年遏制或减缓不正常状态。

显而易见，相当一段时期来新股发行大比例超募现象的存在，不仅对二级市场股价波动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如此现象的出现也不符合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要求。所以在此情况下，对有关新股发行制度予以改进与完善，以遏制新股发行中的超募现象，不但是市场公正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前提。所以，此举值得肯定。然笔者同时也认为，如果能在新股发行制度中引入相关中小投资者参与程序，结果或许能对新股超募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

首先，以利益关系看，自监管层取消对新股发行价格窗口指导后，新股定价并未如监管层所愿走向市场化。由于上市申请人与证券承销商在定价上的利益一致性，因而随着窗口指导的限制取消，使得上市申请人与承销商谋取高发行价的冲动比原先更加强烈与自由。所以在此情况下，对监管层来说，如果能在相关发行制度进行改进时引入中小投资者，并在制度安排上将其作为上市申请人与承销商新股定价的“对手”参与，并赋予中小投资者一定股价（询价）决定权（比如就像股权分置改革时需要有一定比例流通股东认可的方式），那结果就可能由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性，或许会对目前的新股超募现象形成一定的遏制性作用。

其次，以市场公平要求讲，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其中涉及利益相关方，不但有上市申请人与承销商，而且与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也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上，由于中小投资者几乎谈不上能对新股发行价格产生什么影响，而这不仅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并且与市场基本公平的要求也显然不相符合。所以就此而言，首先在对相关制度进行设计与安排时，本着没有保护弱者制度就不会有真正市场公平的原则，将中小投资者参与引入相关制度安排，理应也是监管层不能回避的一个有关市场公平进步的公共命题。

笔者认为，无论以市场利益关系还是以市场公平角度看，对相关市场决策与监管层来说，在对遏制新股发行大比例超募制度进行设计时，都有必要、也应当引入中小投资者参与的程序。

财经杂谈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